

說劫求福

六畜，人皆可食。我吃雞，也不曾作「君子遠庖廚」的想法。但今回卻有「孽」的罪疚感。

眼看雞屍如山，半死的雞在黑塑膠袋中掙扎抖動，這場劫，真是人間之孽。平日人吃雞割雞，是順序運作，雞瘟也是自然之災，可是，這一次是極粗暴、不假思索的人為處理手法。我忽然覺得：這是劫是孽之外，還隱含著天道示警的徵兆。

現試抄錄古書幾段如下：

雞為積陽，南方之象。（《春秋》）

巽為雞（《易》）：巽於方位表東南）

工商執雞（《周官》：取其守時而動）

田饒謂魯哀公曰：君不見夫雞乎，首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鬥者勇也，得食相告者仁也，守夜不失時者信也，雞有此五德。（《韓詩外傳》）

細味上開文字，再想幾天之內，殺雞過百萬隻，未免心寒。地處東南，以工商為務的香港，殺去盈百萬的德禽，是不是可解作：工商不守時而動，社群失去五德？也許有人認為禽流感一旦傳播，危險更大，危及人類生命，二者擇其一，權衡之下，只好以雞為犧牲了。無奈只有慨嘆：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災劫已成定局，善後工作未知展開多少。順溝渠而下流的雞血，流到何處？堆填區的雞屍是否穩埋不露？腐朽後細菌會變種變型重出為害否？餓狗拉去吃剩的殘肉會不會散落民居角落？從事殺雞的人員心理有無變異？……災還未及身的人，有沒有考慮？

人無遠慮，急功近利，在深信業障之餘，也該反省察己，以求多福。

話雖老套，但我仍以此為念。新年開筆，說劫為求後福，願香港人遠離魔伴，速得圓滿。

◆ 一九九七年本港首次發現禽流感可感染人類，亦是全球首次同類個案。爆出疫情之初，時任衛生署長陳馮富珍為安撫市民，在鏡頭前豪言自己日日食雞，試圖淡化疫情，但此話一出即令人嘩然，更令她得到「雞珍」的稱號。事實上，這場世紀大瘟疫，造成高死亡率，導致港人要同走地活雞「脫離關係」。該場疫情共有十八人感染E6N1，其中六人死亡。政府首次決定大規模銷毀家禽，數目達一百三十萬隻活雞。那時候，漁護署人員，全身保護裝備，走進雞場，注入二氧化碳把活雞焗死。

——香港01記者〈活雞何價 防禽流感花千萬 賠

償金累計二億〉，見二〇一六年六月十一日香港01

網：<https://www.hk01.com/> 社會新聞 125327

一九九八年

往事

翻閱一九三〇年舊報，在排得密麻麻的發黃紙面上，忽然，真是忽然，因為我搜尋的目標不該在那版面上，發現盧冠雄三個字。

遠在我還沒有來這個世界前，那三個字印在報紙上。他在幹甚麼呢？

「孔聖會誕紀念會勸捐伸謝名冊」，全是負責拿捐冊去募捐和捐款人的名字。裡面載刊著盧家父子兩代的名字：盧頌舉、盧冠芹、盧冠豪、盧羨卿，還有我父親盧冠雄。

他拿到的捐冊是第九十七號，看來，他並不太熱心勸捐，冊裡只得兩個人，每人捐了五塊錢——三十年代初，五塊錢也不算個小數目，只是兩個捐款者，比起別人捐冊，果然是少了點。看著父親的捐冊，不禁笑了，那就是父親的個性。

一九三〇年深秋的日子，不知誰把孔聖紀念的募捐冊交給他——奇怪，從不曉得他與孔聖會有過關係，也沒聽過他提及社會公益——他對我只講過吃喝玩樂：一本正經對著十二歲的孩子講石塘咀飲花酒、講各家各店的好吃東西、講火燒前的馬棚熱鬧，下班在家就拿著

赤鬍子精神

杜杜說起三船敏郎來，自然也提起黑澤明，惹起我一連串回憶。

我不會忘記他們二人合作的《赤鬍子》，對我的教育工作態度有多大影響。

這套電影拍成於一九六五年，大概到六六、六七年以後，才在香港放映，那正是我投身教育工作的始點。當時的學生當然沒有現在的那麼複雜、那麼多問題，但一代有一代的困難，對初入行的年輕教師來說，總會面對一些難以應付的問題學生。愈是熱誠，就愈容易遭意想不到的冷水潑得身心俱冷，滿以為自己付出足分，到頭來學生卻全不接納，甚至曲解好意，這樣情況遭到無數次，就難免洩氣。我就是在那種情況下，洩了氣。

剛入行就洩氣，這危機令我很恐懼，後頭的日子正長，除非我改行，或像一些看化了的同行，成了老油條度日，否則，我必須自救。教育學院課程沒有教我怎樣應付這種心理危機，那時候還年輕的我真是求救無門。自問又真的熱愛教學，給少數甩開餵藥的手的學生弄得我放棄，未免心有不甘，怎樣辦？這幾乎是我天天撫心自問的問題。

就在這時候，黑澤明導演、三船敏郎演的《赤鬍子》在香港上映，其中一個情節給了我極大啓示，有如救生圈，借了力，我總算「得救」，到今天，在教學途上，每遇甩開我的手的人，我總會想起電影裡三船敏郎扮演的「先生」。靠一套電影來作救生圈，看來有點幼稚可笑，但對我來說，這是事實。這電影重映的機會不多，於是，我買了一套錄影帶放在家裡，作為心理療劑。

《赤鬍子》裡，三船敏郎飾演的醫生，是個沒有笑容、兇得像個汪洋大盜的老師——既是醫生，又是醫學教師，他收了許多徒弟，邊行醫邊授徒。有一天，他從妓院裡救出了一個病重的雛妓，命今年輕醫學生負責看顧餵藥。年輕醫生滿懷愛心不眠不休地照顧著小女孩，可是對人類失去信心的孩子，每一次都帶著仇視痛恨的目光，用力把送藥的手甩開，打翻了盛藥的調羹，無數次的惡意拒絕，令年輕醫生傷心頹喪，老師在旁看得清楚，一言不發接過了調羹，蹲下來，帶著微笑面對小女孩，這是他的學生和觀眾第一次看見他的笑容——一個汪洋大盜的臉上，有如春陽和煦的笑容，太矛盾了，很容易給人奸的印象，但三船敏郎演技在這刻發揮得十分出色，觀眾完全忘記他先前的黑口黑面、兇神惡煞的樣子。可是，女孩子並沒有領情，一次又一次用力推開老醫生的手，老醫生側著頭，笑容更和煦，一再送上藥匙，惶恐的孩子臉上仇恨顏色逐漸褪去，也側著頭看著老醫生，再試探性的推開調羹。今回用的力不那麼大，老醫生再送上藥的時候，終於她張開了口，吃了醫她身體

疾病的第一口藥，同時也接納了治她心靈創傷的首服靈方。

那麼詳細敘述了上述片段，只因每一次想起連串鏡頭，小女孩推開藥匙的抗拒力度，和老醫生再送上一口藥的決心和艱難，那種感覺，三十年來，仍然沒有退減。赤鬍子精神，就是指這組鏡頭。

——分上、下兩篇刊一九九八年三月三十一及四月一日《星島日報》副刊「七好文集」專欄。

一九九八年

讀洗玉清

《純文學》復刊第二期上，有一篇很具歷史價值，很動人的人物傳記：〈一個女子與一個時代〉。作者是寫《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的陸鍵東，傳主是與香港文學文化關係密切的廣東女學者洗玉清。

對於洗玉清，我知道的只是她的學術成就，她承繼樸學傳統，在考據分析、史料蒐集方面，十分沉實，功力深厚，是女界少見。她在聖士提反女校讀書之前，已深受教育家陳子褒的影響，在她紀念恩師的一篇文章，〈改良教育前驅者——陳子褒先生〉中，她說：「先生教人要旨，一曰不倚賴政府，二曰不靠商業，三曰提倡忍耐，四曰提倡女權，五曰提倡以善勝惡。」突顯了陳老師主體精神。讀了陸鍵東的文章，才更深體會師恩之厚，和學生如何一生實踐老師之教。由於陸鍵東文中引用了洗氏的《自傳》未刊稿，就讓我對這位女學者的一生行事知得更多，例如她為了不負陳子褒「終身執一業不變節，可為後進楷模」的期許，「立意救中國，也立意委身教育。……想全心全意做人民的好教師，難免失良母賢妻

之職；想做賢妻良母，就不免失人民教師之職，二者不可兼。所以十六七歲我就決意獨身不嫁。」五十八歲之齡再到北京，「本來想去看看新建設，豈知參觀北京圖書館後，看見它的好書，就日日去抄。早去暮歸，連飯也在館員處食。想入京一個月，竟然為看書而住到兩個多月，館主任說甚麼借書都讓我看光了。」進入文化寶庫，樂而忘返之情，躍於紙上。

洗玉清對學術的堅持和成就，我們在她的文集集中，可以看到。她積數十年功力，寫成的文章算多，且篇篇都見如何利用史料得出新見，她的光華文采，不外露卻深為識者稱許。她的詩，我讀得不多，只知道並無閨秀氣，卻帶傷感悲涼。

今回在這傳中，更清楚了她一生為人態度，可以說果是陳子褒的心法嫡傳。

陸鍵東引用了中山大學所藏歷史文獻檔案，記錄了洗氏在一九五二年九月對自己思想所作檢討，足見她的價值取向。她在政治高壓下，如此說：「我嚮往賢人君子的人格，我講舊道德、舊禮教、舊文學。講話常引經據典，強調每國都有其民族特點、文化背景與歷史遺傳，如毀棄自己的文化，其禍害不啻於亡國。……我最同情自古忠心耿耿，而遭讒受屈之人，於是我專找這些人的材料而為其表白。」

她也一如歷來愛國懷憂的知識分子，坦然說出下列的話：「言論自由，處士橫議，是舊名士的習慣。我覺得說說怪話，發發牢騷，寫寫歪詩，事實有之，反黨則絕無此心。一生讀線裝書的人，是安分守常，不會造反的，希望黨相信他們多一點。」

歷史告訴我們，「守舊」的知識分子並不得到黨的相信，洗玉清的生活也不好過。

一九六四年她返港探親治病，居留了十個月，廣州風傳她已逃港不歸。可是她並非如人所想，她在香港立下遺囑，變賣全部資產，全捐給廣東省的醫院，然後返回廣州。一九六五年十月病逝。

一代學人，幸免於文革之辱，算是有福。

——分上、下兩篇刊一九九八年七月十七及十八日《星島日報》副刊「七好文集」專欄。

◆ 一九六五年十月二十一日《大公報》頁四：〈洗玉清家奠明舉行 生前友好致送輓幛可逕交中總八樓〉，內文報道：「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委員會常務委員、廣東省文史研究館副館長、廣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委員、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委員洗玉清，因患肺栓塞於本月二日病逝廣州，享年七十二歲。洗玉清家人現定於明（廿二）日（星期五）上午十時至下午一時在干諾道中華總商會九樓禮堂舉行家奠。洗玉清為南海西樵人，生長於澳門，年十三，受業於名儒陳子褒門下。稍長，讀書於廣州嶺南大學。一九二五年學校聘為嶺大附屬中學專任教員。一九二七年升為大學國文系講師，旋進教授，博物館長等職，為女子教授古典文學之始。之後，聲名洋溢南中，著述凡四十餘種，一生以文化事業及作育人才為己任，被譽為「女中君子是真儒。」



◆ 一九六五年十月二十三日《大公報》頁四：〈悼念洗玉清教授 洗府昨日家奠 親友百餘人前往祭奠〉

一九九八年

美麗的書

香港歷史，暫時還不是史家執筆寫就的——殖民地政府本就想隱埋一切香港身世。可是，每一個香港人都可以從自身開始，敘述零篇片段，書寫成許多香港歷史段落。一九九七年前後，香港人忽然很「急」，歷史翻過一大頁，史家要寫史了。我們怎樣對待從來未寫入史種種切切？許多人回讀了自己生命的來路——《晚晚六點半》就是其中一行步履痕跡。

筲箕灣嘉諾撒夜校！一個滿載青春記憶的名字——對我來說如是，對書裡一群朋友也如是。

作為她的創校校長，我還沒有等她成長，就撒開手了，一直不知道她在許多更熱心細意的人培育下走過艱難但日趨成熟歲月。

讀著這書，我們可以看到二十多年前的香港人生活，不過二十多年而已，香港就是如此走過來的。工廠女工、木屋區、徙置區、失學、貧窮……對現在的許多香港年輕人來說，

那些掙扎求生的描述，可能如粵語長片的情節，只能引起他們哄然大笑，因為距離現狀太遠了，他們會覺得不可相信。但請相信，她們這筆歷史，沒有虛構，是有血汗，有淚水的真實存在。

我已是上一輩的人了，慣了說「教訓」——教訓，對我們向前走是很重要的，所以我還是不怕人說我老土，我要說：「這本書教訓我們，今天的幸福要珍惜，明天如遇上不幸，必須奮鬥求生路。」

香港有美麗的一面，因為有美麗的人，這是一本美麗的書。

一九九八年九月二日

——《晚晚六點半——七十年代上夜校的女工》代序，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一九九八年，作者署名小思。

◆
一九九八年

敵人何在

江水滔滔！

寫下這四個字，我的感情、思維都沒辦法組織起來。視覺接收的影像，與這淡淡的四個文字，距離得太遠了。

大禹的父親鯀，當年治水不力，給舜殺於羽山。禹子承父責，為司空，三過其門而不入，終能平洪水，分九州。治水，遂成中國歷代治國重點。站在都江堰前，儘管在科技發達的二十世紀，我們仍不得不訝於李冰的智慧。可是，當電視熒屏上景象一再出現時：洪峰如狼似虎，自上游撲向下游，沿江軍民以血肉之軀，抵抗洪流，肩負各種可以扔入水中的東西去阻擋阻不住的狂流。一個個年輕身體，靠勾連著的雙臂，築起長堤，生死牌——（快到公元二千年了，古代的忠心「遊戲」竟然還有人玩）「人在堤在」，這誓言，天能鑑否？抗不了洪就是狗熊，誰許下的毒咒？

抗日的八年，呼號「一寸山河一寸血」，如今是一寸河堤一寸血淚，敵人何在？

每逢災禍，我們就會感到中國軍民的可愛與可敬，年老的看透世情，連怨言也不大會說。年輕的人民解放軍，拚命與無火無炮的敵人對抗。敵人何在？

不要全硬算在甚麼厄爾尼諾頭上去。長期的水土流失，不問情由的亂砍樹木，偷工減料的不牢固堤壩，孰令致此？

幾十年前中國人抗洪，幾十年後中國人抗洪，要抗到何年何日？我們必須知道敵人何在！

自南至北，長江黑龍江……滔滔江水，何時平伏？該問天還是問人？

——刊一九九八年九月三日《星島日報》副刊「七好文集」專欄。

證

❖ 一九九八年是繼一九五四年以來的又一次全流域性大洪水，長江中下游幹流沙市至螺山、武穴至九江共計三百五十九公里的河段水位超過了歷史最高水位。鄱陽湖水系五河、洞庭湖水系四水發生大洪水後，長江上中游幹支流又相繼發生了較大洪

水，長江上游接連出現八次洪峰。長江洪水泛濫是長江流域森林亂砍濫伐造成的水土流失，中下游圍湖造田、亂佔河道帶來的直接後果。

——見百度百科〈一九九八特大洪水〉條 <https://baike.baidu.com/item/1998特大洪水>

一九九八年

定遠號的舵

真的沒有想過一篇二十七年前寫的文章，會獲得一份珍貴的回響。

最近收到遠在加拿大阿伯達大學圖書館工作的左永業先生一封信和一篇刊在《日本研究》的文章，使我十分感動，因為裡面充滿了中國人對國史的關注。

那是關於清朝北洋海軍旗艦定遠號船舵的故事。

一九七一年夏天，我匆匆經過日本長崎，回港後寫了〈長崎今日又下雨〉，提及甲午戰爭中給日本擊沉的定遠號船舵，被當成餐桌架放在一個外國人的客廳裡。這一文章引起了左先生注意，想去追查詳細歷史底蘊。但正如他說：「時隔廿餘載，世事滄桑，不知今天這定遠圓桌還在否？」研究者畢竟有尋根究柢的精神，他直接寫信向葛洛佛（Glover，那座房子的主人）住宅管理當局查詢，果然得到回音。原來當年我遊覽的地方，有個中譯叫哥拉巴公園，園長告訴左先生，那桌子已不再公開展覽，但如他有興趣，可以給他看看。於是左先生就千里迢迢，展開長崎之旅。

日本人也真夠認真，園長小柳伸一郎接待了他，讓他親睹現已不再公開展出的舵盤，並得日本圖書中心出版部及日本近代史研究會負責人提供了定遠號戰傷前後所拍攝照片。這些資料令左先生再深究下去。為甚麼我國北洋艦隊旗艦的船舵，會落在一個居住日本的外國人手中？當定遠號被擊中後，原來不是即時沉沒，日本軍曾登上該艦，還拍下了殘骸照片，相信那舵盤就在那時落入日人手中，作為戰利品。北洋艦隊灰飛煙滅，卻餘下了木製船舵，淪落在敵國人手裡，後來又輾轉變成人家客廳中的餐桌。事隔百多年，還有多少中國人記得它？想來不禁令人神傷。

根據左先生的研究，這個定遠號的舵，見證了日本軍人與外國商人結交的關係。

首先說葛洛佛的身世：原籍蘇格蘭的葛洛佛，於一八五九年由上海到長崎去經商，一直在日本生活了五十二年，與明治時代日本政府決策層結下不解之緣。日本現代海軍創建初期的艦隻，有三艘是經葛氏購置的，都在葛氏家鄉建造。甲午戰爭時，身為日本聯合艦隊司令的伊東祐亨對葛氏十分重視。一八六七年至三菱會社創辦人岩崎彌太郎也認識了葛氏，後來更聘他為三菱顧問，日後日本郵船會社的龐大勢力也源於此。由此種種關係，正如左先生所言：「司令伊東中將以定遠舵盤作為戰利品貽贈三菱顧問葛洛佛，自然合乎邏輯。」由於左先生能細看不再公開展出的舵盤，他可以清楚見到「舵心外緣，刻有曾任海軍大臣、首相、內大臣的齋藤實於一九三四年的題字，詞曰：鵬程萬里由之安，昭和甲戌秋，

題長崎市倉場氏所有故清國軍艦定遠號舵機。」倉場氏就是葛洛佛的日本姓氏。

當年我去旅遊的地方，相傳為蝴蝶夫人故居的，其實就是葛氏住宅，「落成於一八六三年，是日本現存最早的西洋木構建築。一九五七年由三菱會社贈與長崎市政府，連同其附近一帶地區，闢作哥拉巴公園。」

讀了左永業先生的〈甲午旗艦定遠號圖說〉，清楚知道了這一段舵的故事，也補足了我當年匆匆一瞥的記錄疏漏。前後二十多年，才完全了解我國一艘為國捐軀的旗艦的舵的「歸宿」，忽然想到，他日我國興建甲午海戰紀念館，此舵能否回歸國土？應是有人人深以為念的。

——分上、下兩篇刊一九九八年十月六及七日《星島日報》副刊「七好文集」專欄。

證

◆長崎「蝴蝶夫人故居」(一九八二年許迪鏘攝)。



十年暗換

◇ 協辦第三屆香港文學節「香港文學散步·田野考察」活動

原來，已經十年了。

十年世事紛紛擾擾，香港人各自為自己、為世態奔波。誰家庭苑，花開花落，也只有自家人真心關注。

有人落落寡歡，活在一個雖生猶死的世界。有人隱姓埋名，異鄉飄泊。有人爭名逐利，力爭上游。有人改弦易轍，只求生計無憂。也有人無知無覺，且過日辰。十年原是一瞬，歷史家還來不及寫入史冊，人事已多被遺忘。

當然，也有人毋忘某些人與事，正趁十載時機，從頭組合記憶，掀引出種種紀念。有血的書寫，淚有淚的書寫。同一件事、同一個人，不同角度取景，便生出許多面貌。到頭來，英雄狗熊，浪漫悲情，原差一線。真相令人失望，虛構令人神往，敘述者多少想像、多少實證，都由看官自我解讀。

人與事，推遠了，也許更客觀地清晰，也許因遠觀而朦朧。在多事多變之際，到了不

惑之年，仍多疑惑。及至耳順，耳聞多逆而不順，忽然，驚惶失措，不知人間何世。

悄悄沉思苦憶，一切戲夢人生，已過十年。繁華喧鬧，台上燈光燦爛，也算十年。看官，他日你買票入場，或者擎燭高歌，都看作「隊隊行雲散」好了。

近日重翻宋詞，非為閑愁，只因眼前光景，實在無端令人勞累，不如十年一覺，躲入詞心。

信手抄一闕《望海潮》以代茶香：

「梅英疏淡，冰漸溶洩，東風暗換年華，金谷俊遊，銅駝巷陌，新晴細履平沙，長記誤隨車，正絮翻蝶舞，芳思交加，柳下桃蹊，亂分春色到人家。西園夜飲鳴笳，有華燈礙月，飛蓋妨花，蘭苑未空，行人漸老，重來事事堪嗟，煙暝酒旗斜，但倚樓極目，時見棲鴉，無奈歸心，暗隨流水到天涯。」

——刊一九九九年二月十二日《星島日報》副刊「七好文集」專欄。

敬悼舒巷城先生

你，美麗的蝴蝶

為甚麼離家獨自飛行

離開那草木茂盛的山谷？

我怕你的彩衣尚未褪色時

便憔悴地在市街裡飄落

回去吧，這兒不是你歇息的地方

不要把商店 銀行 電油亭……

錯認作 青松 百合 紫丁香……

〈街上的蝴蝶〉

重讀舒巷城先生的《都市詩鈔》，作為向一位純粹的香港詩人的致敬和悼念。

舒巷城先生，當然也是一位香港小說家，許多人提起他，必然提到《鯉魚門的霧》、《太陽下山了》等小說，但我更愛讀他的詩。

他是個錯誤地生在這繁囂而造作的都市裡的詩人，對於繁囂和造作，他卻常以一種獨特的態度來對待。

他帶著溫厚的心思、柔和的目光，遊走在一個並不可愛，但他卻不離不棄的都市。筆下滿寫了只有都市才有的污穢與悲情，請勿誤會，寫實主義不一定要揭露甚麼社會黑暗面，控訴甚麼罪惡壓迫。寫實中，充滿了他豐盈的關注與諒解的無奈——這種感情和態度，是十分香港的。「香港的」這個詞雖然有點彘扭，也不是我故意避用「本土性」，而是那種感情和感覺，真的只有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才會具備。同是寫藏污納穢的後街，採景相同，他寫的《妓院街》、《灣仔之西》，與袁水拍的《後街》，在感情就有極大差異了。

他筆下的香港，沒有美化，也沒有醜化，是一個實實在在的香港。他誠心描繪著香港的某些階層的實況，如果真的有點批判意味，那恐怕也不過是源於他的關注。

多少年來，他沉默地生活在這都市裡，也許像他寫的思古先生一般，「生錯了年代」，但他已經盡心記錄了香港的都市滄桑。舒巷城先生是一位純粹的香港詩人。

◆ 舒巷城（一九二一—一九九九）是香港著名的鄉土作家。他在本港出生、成長，小時住在西灣河一帶，因家裡開小店舖，經常接觸到社會低下層的人物，對他們的生活有深刻的認識，豐富了他的寫作題材。戰時他流亡國內，跑遍大江南北，見識不少。戰後，舒巷城回到本港生活，正式展開了他漫長的寫作生涯。他是位詩人，也是個小說作家，一生寫了十多部作品，最膾炙人口的，是長篇《太陽下山了》和短篇《鯉魚門之霧》。

——許定銘〈舒巷城的《山上山下》〉，見香港文化資料庫：https://hongkongcultures.blogspot.com/2014/10/blog-post_19.html

一九九九年

用語心理

到過德國好幾次，但都匆匆留一兩天，又是隨團行走，沒有單獨接觸民間。除了旅遊必到景點，算到此一遊外，其實甚麼也沒看過。今回總算多留了幾天，也有機會在街上閒逛，才對這個國家稍有一點點感覺。

早已知道英美人叫德國人做「方頭」，日耳曼民族的一絲不苟也是聞於世的，他們對自己的語言文化極尊重——許多國家對自己的文化都十分尊重，只是態度與程度不同而已，日本人又崇洋又尊重自己文化，他們以「好客」姿態令外人認識及愛上日本，德國人卻不。硬繃繃，你來了就該認識我們！不懂德文，你活該。

一大隊人在法蘭克福，去坐電車上街。先去總站向電車司機問路，他正悠閒在車上看報紙。有人用英文問他，只見他愛理不理，用手指指一個方向，其實也證明他聽懂英文。我們仍不大明白，再問，他就不再理會了。——在日本，日本人通常會盡力了解你所問，並努力為你指引，或再為你去問別的路人。終於阿慧用德語再問一次，他卻立即放下報紙，

走下車來，細心指路。也許這只是個少數例子，不能作準，我卻留下深刻的印象。

尊重自己的語言文字，儘管有人認為德國人或法國人的做法未免過了頭，可是，對自己國族文化的尊重，首先在於對自己國家語言文字的重視。小時候，讀法國作家都德寫的《最後一課》，描述了國家被入侵的人民，受壓制不許再用本國語言，師生在上最後一課時的悲慟，還是小學生的我們，也受到感染。正因這個印象太深刻，看到香港某些人——學生和家長，因自己或子女所讀學校不被認許為英文學校時的悲憤與徬徨，我無法不承認，港英政府多年的統治策略的成功。

強勢的外國文字要學一點，作為應用工具，是有幫助的，但重要的是用時心理和態度。這是整個民族的尊嚴所繫，也是教育的重點之一。

——刊一九九九年九月四日《星島日報》副刊「七好文集」專欄。

◆ 證

◆ 一九九九年一項調查顯示，接近一半的中文中學學生被訪者認為自己是次一等的學生，而這些學校被訪的老師和校長有一半有相同看法。當時報章刊登的一些議論發人深省：「熒光幕上，幾個中學生淚眼盈眶，認為所讀學校不被列為英語學校是一種恥辱……校長和老師也滿臉不悅，認為教署評核失實。……看見校長和學生為了不能用英語上課而咬牙切齒、痛哭流涕，心中真是感慨不已。」（陳中禧，教協轉載《星島日報》，一九九八）

——張勵妍〈「母語教學」問題淺析〉，香港中文大學學位教師教育文憑課程論文，二〇〇一年，見「華語橋」網：<http://www.huayuqiao.org/articles/zhangliyan/zy03.htm>

記趙清閣

趙清閣女士去世了，上月的二十七號或二十八號——連正確離世的時間，在上海華東醫院陪伴的小保母都說不清楚。

有多少人會知道中國有過一位著名女作家、編劇家：趙清閣？

三、四十年代，她主編過《婦女文化》月刊、《彈花》文藝月刊，寫過小說《早》、《華北的秋》、《落葉》、《月上柳梢》。她與上海電影界關係也十分密切，劇本有《此恨綿綿》、《冷月詩魂》、《賈寶玉與林黛玉》、《蝶戀花》、《向陽花開》、《粉墨青春》、《女兒春》……抄下一段資料，只想介紹這位對許多人來說的「陌生者」。

文革過後不久，我在上海拜訪了施蟄存、趙清閣兩位前輩。風暴剛過，人們仍面有惶恐之色，惴惴不敢多言。施蟄存先生還執意要請我去吃一頓午飯——那個時候，百廢待興，靠老情面，才可以在國營名店梅龍鎮找個座位。當年的梅龍鎮老店，絕不是今天所見的富貴相。店內黑沉沉，一股飯菜油漬味，衝著人。侍應同志愛理不理，趙施兩老，必敬必恭，

看得我心有不忍。坐下來，叫了菜，兩老話才多起來。趙清閣忽然問我，你知道這個地方嗎？我當然不知道。二十年前，港滬如斯隔絕，何況那時候文化資料缺乏，我也只從舊存書刊中，讀過作品才認識他們。說起梅龍鎮，趙女士清寒的臉上驟綻光采，原來這家店是舊日上海文化界、電影界常聚會歡宴之地。她一一指點談著，在黑沉中，我們彷彿回到當日的亮麗。

過去五十年，不少文化人在政治大潮中隱沒無聞，他們沉默地活著。他們沒有忘記過往的工作，但很不幸，時代忘記了他們。多少年來，不懂也不願尋門路、不求請托的老作家，就連活著也成問題。例如趙清閣、陳敬容兩位，年老孤苦無依，令人悲愴。

到今天，她們已一一離世，文學史家會給她們留多少筆墨，已經不再重要了。

參

◆ 文革以後，我第一位認識的女作家就是她。……她清朗眼神、輕盈談吐，與當時許多人還未敢暢言的態度，很不一樣。

——小思〈詩魂冷月〉，見二〇〇六年六月八日

《明報》副刊「一瞥心思」專欄。

證

◆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清晨五時許，我在細雨中趕到上海華東醫院，在細雨中，伴送趙清閣阿姨從病房進到陰森冰冷的太平間——她人生最後——的這段路。……以中國新文學而言，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開始文學創作的趙清閣阿姨，應該算做是第二代女作家。趙清閣阿姨開始文學工作的時間很早，不到二十歲，她已經在家鄉河南省的省級報紙上正式發表作品。二十來歲，就在上海擔任了中國第一家婦女出版社《女子書店》的總編輯，同時主編《婦女文化》月刊。直到一九九九年去世，趙清閣阿姨始終沒有放下過筆，……在大陸，長壽作家有，但在這麼漫長的世紀歲月中，真正沒有停筆、始終堅持以寫作為基本工作的作家卻不多，少之又少。

——洪鈴〈梧桐細雨清風去——懷念女作家趙清閣·上〉，見二〇〇九年十月《香港文學》298期。（按：洪鈴為劇作家洪深的女兒，洪深與趙清閣是「忘年之交」。）

二〇〇〇 ❖ 二〇〇九

Good Grief

◇獲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模範教學獎

六十年代初，陸離在《中國學生周報》轉載《花生漫畫》，是香港中文報刊介紹花生家族的第一人。到一九九九年底，跨千禧，一月三日，在《星島日報·星辰》中撰《花生漫畫》，正於舒爾茲封筆之日，可視為第一代花生迷對花生家族的有緣有分，有始有終。

當年香港沒幾家英文書店會入《花生漫畫》，我們除了在一家最大的買到外，還得到美國訂購。六十年代美國日本開始把漫畫人物商品化，製成手帕、筆筒、筆袋、杯子、信封、信紙、小紙本、各種賀卡……令花生迷如癡如醉。香港專門，也算唯一的專賣店福友行，賺了我們不少錢。七十年代，陸離和我的藏品，都曾上過電視。

八十年代，花生家族中最出鋒頭的竟是小狗史諾比，商人大力推銷下，變成偶像，九九年麥當勞的換購狂潮，把商品化推到極點。細想在排隊人龍中，有多少人通讀《花生漫畫》？深知花生的無奈、面對失敗的人生觀者，又有多少人？不禁啞然失笑。查理布朗注定一生失敗，特別敗於自己養的狗，也真體現了人生的無奈。

當花生商品多得流於濫，香港小孩青年紛紛買來裝飾，而不去細讀原書時，我也意興頹然，把所有藏品轉送給陸離了。如今只剩下在辦公室書桌上，由艷紅褪色至微黃的花生族筆筒，和家裡日用的茶杯，尚殘餘著第一代花生迷的身份印記。

跨過千禧，舒爾茲停止了花生家族的生命，我以文字轉敘四幅漫畫以送行。

第一幅：史諾比坐在一棵大樹下，抬頭上望。第二幅：一片葉子自樹上落下。第三幅：葉子快落到地面。第四幅：史諾比低頭看著跌在地上的葉子。Good Grief。

——刊二〇〇〇年一月三日《星島日報》副刊「七好文集」專欄，是作者在這專欄寫的最後一篇。

◆ 同是古稀的中大校友，一位是把《花生漫畫》引入香港的《中國學生周報》晚期主編，一位是為香港文學勞心勞力的著名作家，兩位老人家說起花生主角之一的 Linus 後期被史諾比搶去艷光，會各執一邊電話筒暗自抽泣，相信世上也只有陸離與小思會表現出這種對《花生》的關愛。

「你問我《花生漫畫》向我們宣揚了甚麼『花生精神』？沒有，喜歡就是喜歡，不能言喻。」樣子有八成似花生另一主角 Marole 的陸離劈頭說，小思以老師口吻補充：「最初是陸離建立了花生的平台，慢慢彼此有了共同話題，又覺得花生得意之外有哲學性。漫畫不只是漫畫咁簡單，它必須啟發人，我們不只要得意，得意後是甚麼？更需要深沉的思考空間，通過佢諗自己啲嘢，而唔係公仔一個這種閱讀方向。」

——鄭天儀〈我們都是花生友……〉，見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七日《蘋果日報》副刊「果籽」。網上讀取：<https://hk.lifestyle.appledaily.com/lifestyle/special/daily/article/20140727/18811904>

◆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花生之父」舒爾茨先生證實患上結腸癌，被迫宣布於二〇〇〇年初封筆，專心治病。最後一篇《花生漫畫》則於二〇〇〇年一月四日在報章上刊登。而發行《花生漫畫》的書商於二月十三日在每周日出版一次的書刊中，刊載最後一次《花生漫畫》。

——見：<http://tonkyk.tripod.com/snoopy.html>

二〇〇〇年

話說灣仔

我搬離灣仔二十多年，可是，她仍令我牽腸掛肚，說起來話就多了。

「七千美國水兵湧港」！灣仔，這個瀾漫著蠱惑、肉慾聯想的名字，又湧現在七千個兵哥心頭了。而我只能說，這就是命——灣仔的命中注定，帶了桃花邪運。也許，那是一筆孽債，延綿一個世紀。

那是十九世紀中葉，站在船街朝北街頭，就會面對維多利亞港的海傍。叫船街，就因為可以看見船。回過頭向南山邊望，洪聖廟裡，漁民上岸供奉的香火鼎盛。應該還有一座大王廟，如果不是，怎會有大王東街大王西街？靠近海，來自四海的浪蕩兒，就會上岸腳踏實地，除了酬神感恩的心靈慰藉之外，還得證明肉體的果然存在。船街、石水渠街一帶，女人幹著最古老的行業，跟西環石塘咀的阿姑不一樣，她們享不了十二少的揮金與情義，貧窮的一宵交易，只有骯髒，沒有記憶。

船街在海傍的光景，我沒趕上，以上一切，都單憑文獻紀錄，再添想像得來，卻足夠

證實，灣仔的孽債由來已久。

我出生於灣仔，從懂事開始，看見的海傍，就在告士打道。填海改變了灣仔的地貌，但命，卻沒多大改變。

父親愛到海傍散步，晚飯後，穿上布鞋，「去海皮啦」，父女二人便下樓去閒逛一回。自軒尼詩道轉出柯布連道或菲林明道，總得經過洛克道、謝斐道兩個街口，那一帶都是寧靜民居。到了海傍，店舖沒開幾家，灣仔差館重門莊重，右邊幾戶是小型貨棧，沒人氣。父親會拐向左邊，路過金城戲院、六國飯店。這樣走，必然經盧押道或分域街走回軒尼詩道。這樣走，經過的謝斐道和洛克道，氣氛就很不一樣。舞廳、酒吧、賣些不明所以東西的小店，輝煌不輝煌的開著，紋身店在二樓，溪錢張張自樓上飄下，老女人蹲在坑渠邊燒金銀衣紙，紙灰飛舞如幽魂。幾個年輕妖冶女子站在店前或者梯口，自顧自地談笑。這時候，父親臉上總會泛起奇異的笑容，而我，早就懂得緊緊握住父親的手，快走幾步，把他拉離色慾視野。四十年代末，我只是個小學一二年級學生，很乖很純，但父親從不忌諱甚麼，在逛街時告訴我許多故事，包括塘西風月和灣仔花事——花事，是男人想出來，做壞事做得心安理得的雅詞，我怎也不能接受。父親還描敘過三年零八個月日佔時代，在洛克道慰安所裡，香港女人的悲慘遭遇。為甚麼慰安所又要設在灣仔呢？父親說九龍也有。為甚麼香港區要設在灣仔呢？大概因為靠近「鐸也」，那個海軍基地吧。父親最怕我刨根究柢，他必

須找個令我信服的答案。

五十年代，國際風雲正緊，香港在遠東地位不尋常，說是水深港闊，各種船艦補給服務周全，英美艦隊到來，原因大方正常。但還有眾所周知的其他原因，美國艦隻來得最多。穿雪白夏服或海軍藍冬服的兵哥，在分域碼頭上岸，就像蝗禍蜂陣，穿插灣仔街頭。他們買醉，醉得昏昏然，他們尋歡，歡得七顛八倒。都該多得那個塑造蘇絲黃的 Richard Mason 唔少，再加上電影裡關南施的外國人心目中的「中國女人」相，兵哥攬住個中國女人，就以為自己威廉荷頓，還一生情債。

蝦球在這一帶繞了十幾轉，然後走出告士打道邊，六姑一手拉住他，教他一句灣仔通行英語，央他幫幫忙，叫他到海邊跟那個半醉的水兵說：「標蒂夫格爾，溫那，端蒂法夫打拉，奧茄？」

我們沒有 Richard Mason，卻有黃谷柳。他在《蝦球傳》裡，把灣仔春園街、修頓球場、告士打道一圈風月地細加描繪了。你試猜猜六姑教蝦球的那幾句灣仔通行英語是甚麼意思？真可惜黃谷柳不用廣東話記音，寫下來只是洋涇濱，失去本地風味。

五六十年代住在灣仔的良家婦女，確實無奈也無辜，半醉或大醉兵哥，情急性急，不知就裡，不懂門路，往往在路上亂顛狂闖，有時候更會到良家來拍門吵鬧，嚇得女人小孩東躲西避。受過驚恐，到今天，我對水兵仍存反感。奇怪的是記憶中，只有穿雪白夏服還

有黑亮皮靴的水兵，卻不記起海軍藍。

不必考究從甚麼年代開始，不再看見穿軍服的兵哥在路上走。灣仔又從海奪地，地圖上多添港灣道、會議道、博覽道。政府大樓、各種商廈、酒店、會議展覽中心，都建起來了。政治行政商務進駐灣仔，反過來可以這樣說，中環的行政商務地位給灣仔搶去，有點不服氣，建在灣仔的「中環廣場」命名，很有些醋味的象徵意義。金紫荊、回歸碑，都安放在灣仔海傍，移交大典在那兒舉行，升旗禮在那兒舉行，我還有甚麼不放心的？灣仔要脫胎換骨了。七千沒穿軍服的美國水兵上岸，報上照片，都見他們在灣仔作樂狂歡的樣子。今回，等待著他們的還多了菲籍女人。黃昏時分，灣仔的某些層樓上，還有溪錢飄飛嗎？

在智慧型高科技設計的大廈外，在電腦控制玻璃幕牆閃燈的光華背後，灣仔竟然仍沒法擺脫命中之孽，Vice Returns to Wan Chai: 一九七七年有人在西報上慨嘆，今日，我也許是過慮了。但誰叫我生於灣仔？

再加一筆：我沒忘記解開謎語，那幾句灣仔通行英語是：漂亮女子，一晚二十五元，OK？想深入了解灣仔身世，請讀施其樂著，宋鴻耀譯的《歷史的覺醒——香港社會史論》中的《灣仔：尋求認同》。

——刊二〇〇〇年三月號《明報月刊》總411期，作者署名小思。

二〇〇〇年

圍巾

那年，十二月，香港天氣已經冷了。看照片中三個人穿的衣服就知道。

站在中間的我穿得特別臃腫，因為怕冷。圍巾是新加上了，唐君毅老師說京都冬季地寒，師母買了一條金褐色純毛圍巾送給我。

一九七二年，幾經辛苦才辦好去日本遊學的入境手續，還是唐老師寫信幫的忙。老師認為我該在中學教學崗位上停一停，讀點書，回眸反省，我就決定去京都了。從沒有離家經驗，有點慌張。啟程前，到九龍塘翠華園去拜別老師。老師說你來我家吃頓飯吧。飯後師母就拿出圍巾來，並為我圍上。也沒想過，唐老師說要到樓下園子裡拍一張照，——我從沒膽量提出跟老師合照，那天真有些手足無措。

且看我雙手垂直，笑容靦腆，就可推想我有多緊張。

照片是師母寄到京都給我的。收到的那一天，京都剛下大雪。我還沒來得及買帽子，上學時，用圍巾把頭圍密，只露出眼睛來。鼻子噴出的暖氣，困在圍巾裡，暖和得很。

這條圍巾，伴著我度過京都的嚴寒。回港後，我一直捨不得用，用盒子藏起來。

——刊二〇〇〇年五月《文學世紀》第二期，作者署名小思。

參

◆ 戴起圍巾跟老師、師母合照。見《文學世紀》小思文附。



二〇〇〇年

童夢一場

我有一個童年的夢，很奢華、古老的夢。這夢牽連著一個古老的名字：通濟隆——這名字只在中國上一代航運界流行，但它的英文名字，在許多愛到外國旅行的人心中，倒曾是響噹噹的。那就是 Thomas Cook。

今年夏天，報上竟看到它的小廣告：外蒙古首都直航首訪。我毫不考慮，立刻報名參加了。

此去，不是為了目的地吸引，一切為了主辦者的名字，為了圓一個童年的夢。故事必須從頭說起。

四五十年代，中環海旁，現在文華酒店所在地，是一座幾層高的西式大廈。大廈外懸掛了四個有一層樓那麼高的英文字：COOK，父親告訴我那是一家英國航運公司的名字，很早就在中國辦運輸旅遊業務，乘飛機、坐大洋船去環遊世界，就得「幫襯」它。環遊世界？活在貧窮社會的孩子，不懂得，回家問母親。媽媽說那是到很遠很遠地方去玩，那家

洋公司收費昂貴，奢華得很。只因說起環遊世界，父親不知打哪兒找到一些世界名勝明信片回來給我看，從此，到很遠地方去玩，就得「幫襯」Thomas Cook，成了一個夢想。

漸漸社會富裕了，旅遊已成普遍消費行為。我每年總會到外地旅遊一兩趟，卻從沒有動心要參加 Thomas Cook 辦的旅行團。有些朋友到英國去，才在當地入團，回來說團友都是外國人，像聯合國，同枱吃飯，交流不易，很不自然。這正是我那麼多年來不敢嘗試的原因。

直到一則外蒙古首訪小廣告出現，中文廣告，說得一清二楚，「通濟隆旅行社……帶你去參觀。」我哪有放過之理？隔了五十多年未圓童夢，儘管遲了些，但仍來得及，報了名交了費，就興奮等待啟程。

朋友知道我要去外蒙古，都很擔心。那是與香港相當隔離的陌生國家，開發情況、文化風俗、人文地理，我一無所知。想找本外蒙史或社會研究資料冊也不容易。學生從網上下載的材料，提供的都是個別旅人經驗，作不了準，例如說住宿旅舍，沒有喚起床服務，但他仍能依時醒來，只因有馬敲窗。（其實這個記述，十分有趣浪漫，也是難得經驗。）不過，我並沒後悔，因為我目標不在外蒙古，而是通濟隆。我還安慰朋友，辦給外國人參加的旅行團，大概不敢馬虎取巧，何況歷史悠久，招牌要緊，應該信得過。

佩起簡單設計、毫不花巧的團章：紅底反白字 Thomas Cook，我感到圓夢的真實。八天旅程過去了，心情真是一言難盡。

烏蘭巴托去過了，蒙古包住過了，外蒙古之行，可算增廣見識。可是，「參加通濟隆去旅行」的夢，一個童年夢，卻逐天逐天給撕碎了。

不曉得是老字號老化衰退，還是在香港的分店所托非人，又也許是我盼望過久——盼了五十多年，太理想化，結果給那些「通濟隆辦團」方式、帶隊人的不負責任、破車在長途中超時七八個鐘頭的顛簸，叫我明白：夢，就讓它是夢好了。也許，夢碎的不只我一人，在一個午餐會中（那頓午餐，吃於下午四點多鐘），一位外國團友，站到台上說，他信得過的是通濟隆，所以參加了，但失望了。

圓了未圓？童夢一場。

——刊二〇〇〇年十月號《明報月刊》總第 418 期，作者署名小思。

證

◆ Thomas Cook 是世界上第一家旅行社，已一百七十多年歷史。一八七二年，創辦人 Thomas Cook 籌組一次長達一百二十天的九人環球旅行，但在這次旅行中，中國給他留下的印象有點糟糕。直到二十世紀初，Thomas Cook 過世後，他一手創辦的旅行社才開到了中國。一九〇六年底，Thomas

Cook 旅行社在香港設立分支機構，為來往遠東和歐洲的商旅人士提供出行服務。之後，Thomas Cook（舊稱「通濟隆」）先後在上海、北京設立代辦機構。

——中央社二〇一六年九月十日，見《中時電子報》：<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60910003241-2604092chdvt>